

中国纪事

1932—1939

〔德〕奥托·布劳恩著

中国纪事

1932—1939

[德]奥托·布劳恩著

(供内部参考)

中国纪事

1932—1939

〔德〕奥托·布劳恩著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印刷

工本费 1.20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除了编辑出版党史著作和资料外，还计划在今后有选择地翻译或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我党历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类书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歪曲史实和攻击我党、诽谤毛泽东等同志的内容。尽管如此，这类书中的史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故按原文翻译、翻印，内容没有删节。

《中国纪事》是这类书中的一种。作者奥托·布劳恩是德国人，1932年由苏联来我国，他在中国期间的名字叫李德和华夫。他积极支持和推行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他1939年回苏联，后回东德。六十年代中，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攻击我党的反动文章；1973年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主要记述了1932—1939年我党、我军的一些重要事件，并对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

本书由李逵六、郑伊倩、王亚汶、马其静、赵晓红、区延佳等同志译，李逵六同志校；并由李践为、王仲清同志作了校阅。

一九八〇年三月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在中国期间曾名李德和华夫。

作者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坏的影响，1939年离去。1941—1948年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从苏联返回东德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4年病死。

作者为了迎合苏联领导集团的反华需要，从他的反动立场和观点出发，记述了1932—193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情况，均有所评述。

作者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书中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作者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以奴才自命而已。

本书根据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本译出，对原书内容译者未作任何删改。

目 录

(内 容 提 要*)

前 言1—2

第一章 出发地 上海 1932—19333—39

从莫斯科到上海 一个殖民地城市 对秘密工作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条路线、两种派别的形成 在中央苏区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中央苏区的巩固 蒋介石的第四次反共“围剿” 冯玉祥的抗日行动 中央军出征福建及其影响

第二章 在中央苏区 1933—193440—109

一次冒险的旅行 在瑞金的最初感觉和印象 中央苏区及军队的准确情况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 瑞金党和军队领导的军事战略和战术 “围剿”第一阶段的和局 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党和军队领导人掠影 天赐良机：蔡廷锴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哗变 广昌之战 关于短促突击战术的争论 突围的第一方案 毛泽东转向派别斗争 内线的战斗与第六、第七军团的牵制行动 最后的突

* 德文本为“内容提要”。——编者

围计划 主力的战役行动，还是苏区的撤退？ 长征的最后准备 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被破获，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

第三章 长征路上 1934—1935.....110—200

中国红军的兵力 与项英夜谈 突破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加紧进行派别斗争 部队第一次改编 向贵州的胜利进军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背景及详细情况 遵义会议《决议》及其在党内权力之争中的作用 北部战事的失败 部队第二次改编 损失惨重的通过贵州和云南的强行军 横渡金沙江 会理政治局会议 强渡大渡河 长征目标：是新疆还是甘肃？ 与第四军团的会合 改称第一和第四方面军 任命张国焘为中国红军总政委 两个战略方案 毛泽东和张国焘争夺领导权 毛儿盖的妥协 军队和党的分裂 政治局在巴西对张国焘的批判 一方面军的第三次改编 长征的新目标：陕西 长征的最后阶段 到达陕北后的政治阴谋 长征的简短总结

第四章 陕甘宁过渡时期 1935—1937.....201—277

在陕北采取的最初步骤 共产国际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政治方针和毛泽东的篡改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红一方面军撤回陕北 对政治路线的假纠正 扩大宁夏、甘肃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方针 同地方军阀洽谈 反对南京中央政府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两面手法 一个新的全面内战的危险 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的进军和战斗 与第一方面军的会师 四方面军主力的“西征”和失败，谁的责任？ 毛泽东破坏挽救“西征军”的努力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的军官逮捕 人民审判和内战，还是谅解和抗日？ 历史的转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预 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新角斗 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斗争 1937年5月的“党代表会议” 陕甘宁“特区”民政和军事的变化

第五章 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 1937—1939.....278—357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目的和进攻行动 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对立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指示 毛泽东趁国民党失败进行投机 八路军的成就 王明和毛泽东对立 南京沦陷后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毛的战略问题 张国焘的逃跑和出党 瓦解国民党日本占领军后方的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的退却战术和武汉的失守 八路军的观望态度 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是一个妥协吗？ 毛泽东的两面政策 平江事件 国共两党领导之间的公开冲突 战争爆发两周年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忠诚声明和战争宣言 从共同抗日到互相对抗 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我在延安的生活和毛的个人行为 陕甘宁的外国人 毛泽东同美国代表的第一次接触 “延安工作作风” 的特点和它在六十年代对毛政策的影响

尾 声.....358—363

我回到苏联 莫斯科余波 后注

附 录：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364—368

前 言

《纪事》这本书作者奥托·布劳恩，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奥托·布劳恩同志生于1900年，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列中进行战斗。1919年4月，他坚守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之上，二十年代又始终置身于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中，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干部，执行过党交给的许多责任重大的任务。在遭到魏玛共和国法律的迫害和监禁之后，1928年他才得以逃出监狱，并根据党的决定到了苏联。

1932年，奥托·布劳恩，这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前往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七年多充满战斗的生涯。他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先后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南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华北解放区工作过。中国人民解放军^①南征北战，进行了横贯中国的万里长征，奥托·布劳恩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

今天，奥托·布劳恩同志作为许多苏联书籍的翻译者、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院的科学工作者，而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为大家所熟悉。为了表彰他在革命工人运动战斗中的伟大贡献，他荣获了卡尔·马克思勋章、祖国战争勋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其他许多最高奖赏。

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决定性阶段的直接见证人，本书作者回忆了他在中国活动的岁月，为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艰苦奋斗，展现了一幅发人深省的画卷。同时，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马列主义力量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当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经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观点，开始了他们对于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因此，奥托·布劳恩同志的《纪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对马列主义兄弟党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迪茨出版社

第一章

出发地 上海

1932—1933

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两周以后，我身着西装，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已经坐在横越西伯利亚的快车里了。列车把我带到边防城镇满洲里，从那里我继续乘车前进，在哈尔滨作了短暂停留。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几次旅行，象第一次旅行一样，都没有发生意外。

因为从南满铁路两边的高粱地里，时有中国爱国者开枪袭击，所以火车上有日本兵守卫。我乘火车先到大连，从那里又乘船到了上海。虽然沿途受到白俄分子和日本密探的严密监视，但总算安然无恙。

在上海，我起初住在礼查饭店^①，这是一家外国人经常出

^① 今浦江饭店。——译者注

入的旅馆，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建筑风格。过了几个星期，我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这样，我才有了社会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受怀疑地进行活动，我需要这种背景，因为与其他外国人不同，我既没有开设商店，又没有足以证实身份的职业。

上海这时呈现着一幅为帝国主义分子所统治的港口城市的典型景象。黄浦江流入长江的江面上，停靠着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军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外国人的城市管理机关用自己的警察执掌市政。市场上充满了进口货，主要是美国的进口货。外国人通过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通过军火买卖和鸦片走私赚得了百万钱财，在跑马厅、赛狗场，或者在无数的夜总会、跳舞厅、海员酒吧间寻欢作乐。

近旁，在港口和街道上，麇集着骨瘦如柴的苦力和乞丐。离市中心不到半小时汽车路程，就是中国市郊的废墟闸北。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上海时，把这个地区变成了一片瓦砾。当时外国人从他们旅馆和公寓的屋顶上，用望远镜眺望这场历时数周的浩劫，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仿佛自己是坐在剧场里。

此时上海是平静了。然而，假象迷人，蒋介石的警探们，依仗着国际警察的支持，白天把大的纺织厂查了又查，夜晚把中国居民区搜了又搜，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谁被搜捕出来，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叛变或者死亡。数以千计的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在这几年里被杀头，被枪毙，被绞死，不仅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武汉、广州和其他城市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参与这些有组织的

谋害行动的除了警察之外，还有同国民党合作多时的流氓集团和蒋介石不久前建立起来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是他们迫使共产党人完全转入了地下斗争。

因此，要对社会的冲突获得真正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冲突象火一样在地表之下微微地燃烧着，只是偶尔在罢工中或者在其他抗议行动中才迸发出来。

然而城市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情绪却是很容易感觉到的。这完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表现为一种公开的仇外心理，这决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在公众中显露出来的情绪，无疑地是一种真正的民族危机。然而这种情绪，却被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当作一种新的革命高涨，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上错误的估计，确定了不符合1932年至1933年中国现实力量关系的目标。关于这点，我以后再谈。

白色恐怖也使我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特别是在我们受到警告以后。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

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调节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如上所述，秘密工作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是中国人，有“洁白无瑕”的护照，又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里居住，相对来说不太危险，但我们也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谨慎，在公开场合只同外国人交往，偶尔到俱乐部去，也尽量不要引人注意。

同中国领导同志接触却是异常困难的，同他们直接联系的只有尤尔特同志和我。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座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有两次我们又转了回来，因为没有见到安全信号，我们不得不到设立在办事处之外的紧急情况联络点去，来安排下次接头地点。后来才知道，这两次没有放信号是由于疏忽所致。除此而外，我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联络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没有发生过意外或者被捕事件。

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这两人都在苏联学习过，俄语说得很好，洛甫还在美国学习过，也会说英语，因此没有翻译我们也可以交谈。有时候，当然不太经常，参加这些谈话的还有其它中国同志，很可能有康生，不过我记不清了。以后大概还

有斯拉文(李竹声)和米茨克维奇(盛忠亮),他们是在1933年从苏联回来的,1934年被捕后成了叛徒。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上海,一方面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一方面同中央苏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和红军主力部队(即所谓中央红军)的所在地,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以及临时的通讯员联络。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没有自己的电台,也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收发报机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同其他苏区和游击区,当时已经没有定期的联系,如果说有,也只是间或通过特派员和通讯员保持着这种联系,但他们在途中常常耽搁数周,非常影响整个工作的开展。同其他大城市党组织的联络,同国民党统治区工业中心的联络,还有同中央委员会设立在北京、武汉和广州办事处的联络,也大体如此。

阿瑟·尤尔特同志介绍我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当时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材料,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多次为她安排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会面。她关于苏区这几年战争真相和情绪的报导,几乎是逐字逐句纪录下来的,她总是把这些报导让我先看一看。虽然这些报导具有主观色彩,而且往往过于夸大,但对我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很有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史沫特莱同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有着个人接触。宋庆龄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因此同其他国民党的反对派,例如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同广东、广西两省省政府的代表,同流亡在香港的中国政界人士都有联系。

当我在上海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于中国政治状况和党内关系都没有足够的、清晰的了解，我所掌握的也只是些残缺不全的、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军事情报。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通过同阿瑟·尤尔特、博古、洛甫等同志的一系列谈话，我对于政治情况有了一个大略的、当然是相当不完全的了解，依据这种了解，当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发展的第三阶段，——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地概括，并没有顾及历史的分期。

第一阶段，大约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其重要标志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直到1925年他逝世时止。这一联盟政策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尽管在思想上尚未巩固的党内，存在着“左”倾宗派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里还是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组织，并且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广州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时重大的弱点，表现在反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剥削者的反封建农民运动的领导中。由于受到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推动，国民革命军在1926—1927年的所谓北伐中，夺取了中国南部和中部的政权。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1926年夺取了国民党领导权，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且在1927年同英美帝国主义分

子和国内军阀、封建主签订了契约，这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遭到了失败。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及在这次大会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虽然有某些反封建的倾向，但还不具备明显的一定的阶级性质。继续同国民党左翼实行联盟政策的企图，或者换句话说，分化国民党的企图失败了。以后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地仅仅依靠工人和农民来进行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接着开始第二发展阶段，社会革命的口号代替了国民革命的口号。虽然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农民问题，但是许多人，包括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把它理解为一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只是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即那些大的财政和商业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一直作为革命动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是反动的；而工人和农民则统统按照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错误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被认为是革命的唯一动力。这就完全抛弃了同中产阶级的联盟政策，以后到了1930年就发展为“左”倾宗派主义、盲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党的领导中得到贯彻，就是历史上的“立三路线”。

两种情况促成了这条路线的产生。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横行，党的工人干部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业已失散；另一方面，由于原先国民军中的一部分革命部队，与农民游击队联合起来，举行起义，在中国中部建立了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这样，阶级斗争的重点就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从工人转向